

红帮裁缝张尚义在日发展时间考辨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Hong Bang Tailor Zhang Shangyi in Japan

刘云华 Liu Yunhua

内容摘要：本文对有关红帮裁缝张尚义在日本发展时间的已有研究结论提出质疑，结合大量档案文献与口述历史资料，从西服业在日产生的社会条件、横滨西服业的历史发展状况、张尚义的出生年份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得出张尚义到日本谋生的时间为19世纪70年代而非19世纪初的研究结论。对这个时间的重新论证，将改变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两个观点：一是张尚义还不能称为“红帮第一人”，他只是早期到日本创业的代表人物之一；二是红帮并非发源于日本，中国裁缝对日本早期西服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正确认识张尚义的历史定位与家族传承，有助于把握红帮裁缝在日发展的完整脉络，由此揭示中日两国在近代服饰西化的历程中相互促进与推动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红帮、红帮裁缝、张尚义、西服业

DOI:10.16272/j.cnki.cn11-1392/j.2018.05.015

红帮裁缝是中国近代最早学习西服技术的裁缝群体，外向型发展是这个群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中红帮裁缝到日本的发展是其向外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有关红帮裁缝在日本的发展历史，已有相关研究成果认为张尚义是到日本从事西服业的第一人，他于19世纪初期到日本谋生，有“红帮创始人”之称。随着近年来有关红帮裁缝新资料的不断发掘与研究的推进，笔者就此观点提出质疑，结合文献资料与口述历史进行考辨。

一、综合分析西服业在日产生的社会条件

据《红帮服装史》中记载，张尚义本为中装裁缝，19世纪初因遇海难漂流日本横滨，到横滨

码头后看到不少身着西服的西方人，由此发现新的商机，开始学习西服缝制。从这段文字记载分析，张尚义能够转型为红帮裁缝，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然而文中所描绘的情形与19世纪初日本的社会背景有所出入。

1. 19世纪初不具备红帮裁缝形成的社会环境

日本与西方的接触始于16世纪中叶，1535年葡萄牙人最先取得在中国澳门停靠码头的便利，而后以澳门为根据地，于1543年乘坐中国船只来到日本种子岛。此后大约100年间，葡萄牙、西班牙等所谓的“南蛮人”通过贸易与传教活动，将西洋的物质文化与宗教文化传到日本，被称为“南蛮学”。^[1]

从“南蛮”二字可以看出，当时日本人对这些西方人以及西方文化持有鄙夷的态度，认为与他们自古所崇尚的中华文化有些格格不入。再加之日本统治者感到信仰天主教的西方国家对日本有领土野心，到17世纪中叶，德川幕府先后5次颁布“锁国令”，实行了严格的“锁国政策”。锁国政策中包括对南蛮文化的全面禁止，所有西洋书籍被统统拒之门外，传播近百年的南蛮文化逐渐消失，日本正常的国际文化输入渠道也遭到严重阻塞。随着日本幕藩体制的确立，在经济空前发展的基础上，产业技术不断发达，“兰学”在日本开始兴盛。但在锁国政策的政治大环境下，日本对荷兰文化也加以严格控制，幕府只开放长崎一处作为与西方经济与文化往来的窗口。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纵观葡萄牙、荷兰等早期海洋强国对日本进行西方文化输出的历史，在日本开国之前，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较为有限，“兰学”虽对日本之后全面吸收“洋学”奠定了良

好基础，但它毕竟还未触及日本文化的根本。

依据以上历史背景，《红帮服装史》中所述张尚义在19世纪初到日本横滨港区后，看到“不少荷兰客商身着西装”^[2]，之后他很快从事洋服业，这个说法不能够成立。首先，19世纪初，横滨港肯定不会出现荷兰人，因为当时荷兰人只能出入长崎一处。其次，如果张尚义当时到的是长崎而不是横滨，也不太可能就此开始西服事业。原因一是长崎荷兰人的数量毕竟有限，对西服的需求量不会太大，从西方运来的西服成品交易应该基本能够满足居住长崎荷兰人的着装需求，在日本西服技术还不成熟的时候，很难形成相应的西服产业；二是当时日本人对“兰学”的接触与了解只限于科学文化领域的精英分子，而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更不可能接受西方服饰，庞大的西服消费群体还没有形成。因此对于19世纪初期尚未开国的日本而言，无论从国家对外政策还是民众的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都还不具备张尚义转型为红帮裁缝的社会条件。

2. 19世纪后半期为西服业的产生提供可能

1853年美国的“黑船事件”最早打开日本国门，其他西方国家跟随美国，纷纷向日本提出通商要求，日本被迫结束锁国时代，幕藩体制也随之瓦解。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政府提倡“文明开化”，开始大力推行一系列改革，加剧了日本社会的西化程度，日趋欧化的社会环境为日本西服业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明治政府所推行的强有力改革，涉及政治、思想、经济、外交、商业等各个领域，旧的制度



1. 19 世纪末横滨海岸商铺 (日本横滨开港资料馆藏)



2



3

被彻底革除, 日本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是凡五十年尽改旧度, 前后若两国”^[3]。在服饰改革方面, 1872 年 12 月, 太政官宣布废除幕府时代的服饰, 将欧式服饰作为国民基本服饰。天皇身体力行, 剪掉发髻, 改穿洋服。《横滨每日新闻》《京都新闻》《大阪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等报刊相继创办, 各大媒体大力宣传天皇学习西方思想和习惯的行为, 传布全国, 以此来号召国民学习欧美文明。在明治政府的大力倡导下, 日本人的着装急剧西化, 上至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 都竞相学习欧式装扮, 留西式短发分头, 戴金色有章绶带。牛肉、葡萄酒、咖啡等西式食品进入普通家庭, 欧式建筑开始融入日本社会, 明治政府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建构了全新的社会风俗。

明治维新时期开化的社会氛围与繁荣的商业环境吸引了大批中国人到日本谋求发展, 其中宁波人是到日本移民的一个重要群体。由于宁波与日本隔海相望, 有利的地理条件使日本与宁波自古就有密切的交流与往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宁波主要面向日本和朝鲜半岛。在悠久历史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基础上, 宁波人移民日本具有天然优势。当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时, 日本近代出现了一次宁波人的移民浪潮, 以手工业者为主体, 俗称宁波“三把刀”, 即“菜刀、剪刀、剃刀”^[4], 其中剪刀就是裁缝行业。张尚义很有可能就是明治维新时期宁波移民群体中的一员, 具备扎实的手工艺功底。在当时日本西化的社会氛围为洋服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可能的大背景下, 他抓住传统裁缝转型红帮裁缝的历史机遇, 开始从事西服业。因此, 张尚义来到日本后若要迅速转型为红帮裁缝, 必

然需要这样一个与传统社会风气完全不同的西化社会氛围。若从社会大环境考量, 他于 19 世纪后半期来到日本的可能性更大。

二、文献考证横滨西服业的历史发展状况

目前红帮研究领域公认张尚义最初漂流到的地方是横滨。作为日本近代开辟的第一个港口, 横滨成为日本城市早期现代化建设的先锋与典范, 开化的都市风气为洋服业的发展提供了大好舞台。笔者也认为张尚义最早应在横滨发展, 因此试以横滨西服业的发展历史, 考证张尚义来横滨的时间阶段。

1. 19 世纪初期横滨未出现一家洋服店

有关中国裁缝在横滨发展西服业的历史状况, 一直没有确凿的历史资料可考。直到 2013 年, 日本宁波同乡会会长孙明峰先生参访宁波服装博物馆, 他从日本带来相关方面的珍贵档案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 有力推动了此方面的研究进展, 有助于本文进一步考证张尚义到横滨的历史时间。

江户时代的横滨不过是一个住户家庭不到 100 个的小渔村, 据《洋服業形成史料として》所述, 19 世纪初期横滨尚未发现任何洋服店的存在。和上海一样, 横滨的发迹始于 1859 年的开港, 由此成为日本对外开放的门户, 从小渔村一跃成为西化十足的大都市。“日本幕末, 横滨开港 (1859 年) 后欧美商人相继来日, 当时日本人的头发是由发髻而改成洋式髻型; 同时日本人穿着的衣服, 也由和服改为洋服西装时代……住在横滨居留地的欧美人士日渐增多, 日本也洋装化, 因之洋服的需要量日增”。^[5] 由这段文字可知, 横滨在开港后, 西方人的数量与日俱增, 日本本

土民众的着装也急剧西化, 由此形成了巨大的西服消费市场。

虽然此时日本具有较大的西服消费需求, 但还不具备成熟的西服缝制技术。最早在横滨开设洋服店的是西方人, 而后是中国人。西方人于 1862 年在横滨开设第一家洋服店, 1868 年横滨又出现两家中国洋服店: “居留地八一番地 ‘WA SING’ 和一六五番地 ‘QUANG CHONG’。”^[6] 从横滨最早开设的西服店时间判断, 在 1862 年之前, 日本根本不具有西服技术发展的条件, 张尚义几乎没有在横滨谋生西服业的生存空间。

2. 19 世纪后半期横滨洋服店迅猛增加

随着明治维新一系列西化政策的推动, 中国人在横滨的洋服事业发展迅猛, 其势头远超西方人。在横滨港岸, 华人洋服店鳞次栉比, 并形成著名的华人商业区。

在日本横滨开港资料馆的图片资料中, 有一张 19 世纪末横滨海岸商铺的照片 (图 1), 该照片下方有日文标注说明这条海岸上有许多中国人开设的洋服店, 展示了中国人早期洋服店在面向海洋、对外交流便利的海岸上的商业环境。图 2 就是位于这条水街 16 号的中国洋服店“复兴昌”于 1890 年刊登的一则英文广告, 内容显示了洋服店以手工缝制西式军大衣为主, 同时制作西式女裙。如果张尚义于 19 世纪中后期漂流到日本横滨, 他很可能选择海岸上中国人开设的洋服店进行学习、从业。19 世纪末, 横滨港中华街也初步形成 (图 3), 在这个以华人为商业群体的街区, 各业华商的群体效应与相互拉动也进一步促进了华人洋服业的发展。由于中国比日本开放时间要早 10 多年, 西服文化传入中国的时间也较早, 因此在明治维新初期, 中国的西服技术远超过日

4.19 世纪末中国人在日本开设的洋服店, 左边为日本职工(《日本妇人洋服史》)

表 1. 中国人与西方人洋服店增长曲线比较, 1862-1900 (根据《日本妇人洋服史》自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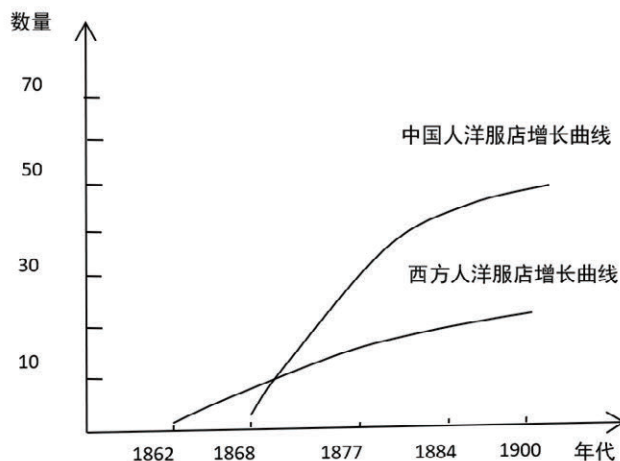


表 1

本, 中国对日本的西服技术与款式流行影响很大。据《横滨华侨志》记载: “中国人做洋服西装, 是日本的先进国, 衣料新颖, 式样入时, 技术高超。”^[7]当时上海洋服店与日本中国人洋服店的店主多为同乡或同族关系, 相互往来较为密切, 这些中国洋服店就成为中日之间西服文化与技术交流的桥梁。“明治、大正时代所流行的式样, 都经中国人的洋服店介绍到日本的居留地”。^[8]两地西服文化与技术的交流, 促进了日本中国人洋服店的快速发展, 这些洋服店以家族经营起家, 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则雇用当地日本人做缝制工。图 4 是最近发现揭示中国人在横滨开设洋服店情形的珍贵图片资料, 图中左边的两位身着西服的男子, 即为店中所雇用的当地日本人。这张图片对于揭示中国裁缝在日发展洋服业的初期经营状况具有重要价值, 有力证明了中国裁缝对日本当地西服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据《洋服業形成史料として》考证, 从 1862 年到 1900 年期间, 西方人的洋服店数量从 1 家增到 23 家, 而中国人的洋服店则从 0 增加到 52 家, 是西方人洋服店的两倍有余。虽然中国人开设洋服店的时间晚了西方人 6 年, 但发展速度却非常惊人。在此期间, 以 1877 年中国人洋服店数量增加的速度最为显著, 表 1 显示了近 40 年间中国人赶超西方人洋服店的发展速度。日本资料显示, 这些从事洋服业的中国人主要来自宁波、上海、广州地区, 他们还在横滨成立了“西洋商馆”。由此可见, 19 世纪后半期中国人在横滨的洋服事

业已初具规模, 特别在 19 世纪 70 年代是横滨西服业初期发展的较快阶段, 此时张尚义到横滨的几率最大, 当地可为他改从西服业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

三、计算推演张尚义的出生年份

在《红帮第一村——张氏等裁缝世家》一文中, 曾提到张尚义出生于 1773 年^[9], 如果以这个年份计算, 他到日本的谋生时间应在 19 世纪初期。但根据张尚义后人的年龄推算, 此文中所提及的张尚义出生年份令人质疑。

1. 梳理历史档案文献资料

按照中国传统的家族传承方式, 张氏家族的子嗣命名遵循严格的家谱辈分排序。在张氏家族残留的家谱中, 记载了家族 16 代的辈分排序: “高尚有方, 师维孔孟, 笔墨纸砚, 文章必成。”^[10](图 5) 十六个字体现了家族遵循传统道德、孔孟之道的指导思想, 其中第二个“尚”字就是张尚义的“尚”字辈, 这个辈分排序方式是推算张尚义出生年份的一个重要依据。

家谱中记载张尚义有三子: 有松、有木、有梅, 当地称福、禄、寿三房。虽然目前未见有张尚义出生日期的可考文字资料, 但在 1922 年的《上海总商会月报》中出现了张尚义大儿子张有松和他的侄子张有福的名字。《上海总商会月报》中介绍了当时在日本横滨从事工商业的中国商人概况, 其中明确记载: “洋服商张有松, 浙江鄞县人, 于山下町 31 番经营‘同义昌’洋服店; 洋服商张

有福, 浙江鄞县人, 于山下町 16 番经营‘公兴昌’洋服店。”^[11]如果张尚义出生于 1773 年, 他的大儿子和侄子不可能在与父辈时隔 100 多年后经营洋服业。另外一个关于张有福的重要档案资料, 可以有力证明张有福的实际年龄。在上海档案馆 1943 年《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执监委成员》名单中记载: “张有福, 男, 63 岁, 籍贯鄞县, 静安寺路 851 号经营‘有义号’, 任监事职务。”^[12]这份材料说明张有福后来又回到上海, 他在国内的西服事业发展较好, 还在上海市西服业同行公会中担任重要职务, 这是有关张有福年龄较可靠的文字依据。如果以 1943 年他 63 岁计算, 张有福应出生于 1880 年左右。

张氏家族中还有一位较具影响力的后人, 就是“方”字辈的张方广, 他在横滨创建“汤姆森”洋服店。由于洋服店名声较大, 其为人又和善助人, 1946 年他被推选为横滨华侨总会第一任副会长, 翌年三月又被选为第二任会长, 在横滨商界德高望重,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横滨华侨志》中记载有他的生平简介: “张方广先生, 浙江宁波府(今鄞县)人, 父有宪公, 于 1900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明治三十八年)来日本横滨经商……1909 年方广生于横滨市中区山下町。”^[13]这个材料中, 张方广的父亲张有宪和张有福是“有”字同辈, 从 1900 年他到日本创业的时间判断, 他的年龄应该与张有福相仿。若张尚义出身于 1773 年, “尚”字与“有”字的相邻两辈分之间不可能相差 100 多年。从以上文献与档案资料推理, 张

文 筆 師 高
必 墨 維 尚
成 紙 孔 有
章 硯 孟 方

5

5. 张氏家族的辈分排序（茅山镇孙张漕家张氏家谱）

尚义出生于 1773 年的说法并不准确。

2. 访谈张氏后人口述历史

有关上述档案文献中的张有松、张有福、张有宪三人，文献中并未出现他们与张尚义之间关系的文字阐述，他们是否确为张尚义的儿子和堂侄，是否存在重名情况，笔者根据张氏家族后人的口述历史资料，进一步证实他们的身份与年龄。

根据 1991 年“鄞县针纺织服装同业公会”相关人员在张尚义家乡鄞县孙张漕村的实地调研资料，张氏家族“师”字辈的张师贤曾于 1916 年到本家爷爷张有松日本开设的“同义昌”洋服店打工；邻村的胡贤齐曾于 1931 到上海张有福的“有义号”洋服店打工，店主张有福来自日本横滨，本为孙张漕村的“张氏”家族后人。^[14]这两份口述历史资料与上述文献资料中张有松与张有福创建店铺的时间信息较为对应，并显示出了他们的家族信息。由此基本证实 1922 年《上海总商会月报》提及的横滨华人张有松应为张尚义的长子，横滨华人张有福与 1943 年《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执监委成员》名单中的张有福同为一入，他应是张尚义的堂侄。有关张有松和张有宪的年龄与身份，还有一份重要的口述历史资料可佐证。2013 年笔者采访日本宁波同乡会会长孙明峰，他的外公就是“汤姆森”洋服店的店主张方广。据孙明峰所述，外公张方广的父亲张有宪出生于 1883 年，他是张尚义家族“有”字辈子嗣无误，张有宪与张有松是族兄，且两人年龄相

仿，张有松也应出生于 1883 年前后。^[15]将口述历史与上述文献资料进行比对，张有松、张有福、张有宪三个“有”字辈的年龄相互契合，“有”字辈出生在 1880 年前后的考证结论基本可以成立。

由此能够推算出，张尚义大概出生于 1858 年前后，那么他到日本的时间应在 19 世纪 70 年代。根据以上有关日本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横滨洋服业的发展历史分析可知，此时正是明治维新改革之际，也是横滨洋服业发展初期最为迅猛的一段时期，这个时间推断与之恰为契合，进一步证明了时间考证的合理性。

结论

本文结合档案文献与口述历史资料，从宏观到微观，对红帮裁缝张尚义到日本的时间进行考证。通过历史考证与推理分析，笔者认为张尚义不是出生于 1773 年，而是出生于 1858 年左右，东渡日本的时间也不应在 19 世纪初而是 19 世纪 70 年代。对这个时间的重新论证，将改变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两个观点：（1）张尚义还不能称为“红帮创始人”或“红帮第一人”，他只是早期到日本创业的代表人物之一；（2）红帮并非发源于日本，因为红帮在日本产生于 19 世纪 60 年代的明治维新时期，而在国内红帮产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 19 世纪 50 年代左右。由于上海开埠早于横滨，国内红帮裁缝的起源也早于日本，并对日本西服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

正确看待张尚义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意义至关重要，他虽然还不能称为“红帮第一人”，却是日本红帮裁缝群体形成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对整个家族同乡到日本发展西服业起到重要的引领与带动作用。在张氏家族的影响下，“孙张漕村”及附近村落的大批村民都踏上了东渡日本从事西服业的发展之路。本村的孙、张两大家族在日本又结盟联亲，共同发展西服业，从而形成强大的家族力量。据统计，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孙张漕村”90% 以上的人家都曾到日本从事西服业，正所谓“一人唱万人和”，被业内誉为“红帮第一村”。

张氏家族世代传承西服业，日本商界、政坛等大人物都曾是他们家族西服店的座上宾，张氏家族是目前资料可靠的日本红帮裁缝传承最为完整、影响力最大的家族，而张尚义无疑为张氏家族一脉在日本发展西服业的开山鼻祖。因此，张尚义是传统裁缝在日本转型为红帮裁缝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成功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必然。有关

他及其家族的历史传承研究，可以把握红帮裁缝在日发展的完整脉络，由此揭示中日两国在近代服饰西化的历程中相互促进与推动的关系。对于张尚义在日谋生的发展时间，则是正确研究此问题的基本起点。望本文的考证结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 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编号：18NDJC014Z）；宁波大学人文社科后期资助专项项目（编号：XHQ1303）。

注释：

- [1] [日]海老泽有道：《南蛮学统的研究》[M]，东京：创文社，1958，第 157 页。
- [2] 季学源、陈万丰：《红帮服装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第 246 页。
- [3] [日]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第 18 页。
- [4] 王良：《横滨华侨志》[M]，横滨：财团法人中华会馆，1995，第 444 页。
- [5] 同 [4]，445 页。
- [6] [日]中山千代：《洋服業形成史料として》[M]，文教女子短期大学部研究紀，1978，第 58-62 页。
- [7][8] 同 [4]，第 445 页。
- [9] 陈万丰、季学源：《红帮第一村——张氏等裁缝世家》[M]，《红帮裁缝评传》，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 278 页。
- [10] 鄞县茅山镇“孙张漕村”张尚义家族宗谱。
- [11] 《上海总商会月报》[N]，1922 年 1 月，第二卷第一号。
- [12] 《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执监委成员名单》，上海档案馆藏，1943。
- [13] 同 [4]，第 1039 页。
- [14] 鄞县针纺织服装同业公会采访资料，记录人：楼树候、徐厚义，采访时间：1991 年 8 月 9 日，采访地点：宁波鄞县张家漕村。
- [15] 笔者采访日本宁波同乡会会长孙明峰，采访时间：2013 年 10 月 8 日，采访地点：宁波服装博物馆。

刘云华 宁波大学